

经典诠释丛书——吕锡琛 左高山 主编

老子精讲

姜国钧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南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经典诠释丛书 主编：吕锡琛 左高山

老子精讲

姜国钧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中国文化经典《老子》的讲义。内容包括：(1) 导读：介绍老子的事迹和《老子》的版本。(2) 原文：分章摘录原文并加标点。(3) 释词：综合古今注疏，解释原文中深奥难懂的字词句，并对原文中的生僻字注音。(4) 释义：结合现实生活，从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逐句诠释原文。全书根据课堂录音整理而成，文字通俗晓畅，内容博通古今中外，有很强的情境性和现实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子精讲/姜国钧著.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8. 1

(经典诠释丛书)

ISBN 978-7-5667-1286-8

I. ①老... II. ①姜... III. ①道家 ②《道德经》—研究
IV. ①B223.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4696 号

老子精讲

LAOZI JINGJIANG

作 者: 姜国钧 (著)

丛书策划: 祝世英

责任编辑: 罗红红

印 装: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张: 13.75 字数: 232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1286-8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343(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zhusy@hnu.edu.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凡有印装差错, 请与发行部联系

经典诠释丛书

主 编：吕锡琛 左高山

编委会：（按拼音排序）

高恒天 姜国钧 蒋美仕

雷 良 李建华 刘立夫

吕锡琛 谭忠诚 曾 峯

张少雄 左高山

总 序

中国经典既是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典范，更是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经典不仅具有原创性，其中蕴含的智慧更具有穿越时空的历久弥新的普世意义。它们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亦是文化软实力的基础。通过解经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着久远的传统。不少解经、注经者在揭示和解释经典本义的同时，根据时代要求表达和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主张与人生旨趣。通过这一方式，人们与先贤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与对话，续接中华民族的文化慧命，构筑、夯实和拓展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中国古代的解经成果虽然汗牛充栋，但尚未形成系统的诠释学理论，而思想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需要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因此，不少学者开始注重借鉴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开展中国经典的诠释研究，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先后有傅伟勋教授发明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个层次的“创造的诠释学”、成中英教授创建的“本体的诠释学”、汤一介教授倡导构建的“中国的诠释学”、刘笑敢教授提出的“经典诠释中的内在向度问题”等关于中国经典的诠释学理论，为当代学人进行中国经典的诠释提供了诸多启示。

在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进一步从现代诠释学的视角发掘中国传统经典的思想精华和生活智慧，让它们不仅成为中国

学术理论创新的源泉，更为充满困惑的今人提供行为指南和人生启示，是本丛书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典来自生活世界，它们是古圣先贤对于本真生命的体认，是民众生活智慧的结晶。实践性是中国经典的基本旨趣。因此，在经典诠释活动中，不仅应当运用常用的思辨、分析方法，更需要在“提升境界”“实践”等核心部分着力。

“实践”也正是诠释学的应有之义。成中英先生认为：“诠释作为一个文明间或者文明类之间的了解活动，它的意义远胜于‘知’，更具有一种指导和规范‘行’的作用。”^①洪汉鼎先生亦将当代诠释学的基本要素概括为“理解、解释和应用的统一”，认为至少要从“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这四个方面来把握其意义，即“它不是一种语言科学或沉思理论，而是一种实践智慧”。^②以上观点很值得注意。我们看到，在进行相关学术研究时，不少人常将诠释学作为一种理论或阐释经典的方法，而忽略了它还是一种“实践智慧”。这是我们需要反省和补课的。

诠释学还强调“视域的融合”。诠释者在解释经典时，都是从自己的当下情境出发去和文本的视域相接触，去把握文本所揭示的意义，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的视域是相融合的。

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的解经活动中，其实也隐含着“视域的融合”。在解经传统中，不仅有专注于经典字句的汉学，有侧重发挥经典之微言大义的宋学，还有唐玄宗等帝王所撰的经典诠释作品，其中既包含了“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又蕴含着“视域的融合”这一向度。卷帙浩繁的解经作品，字里行间反映出先贤对时代脉搏的把握，贯穿着对当下境况的深刻思考，承载着“继绝

^① 成中英：《经典诠释与国学新视野》，光明日报，2011-12-27。

^② 洪汉鼎：《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7。

学”“安天下”“开太平”的社会责任和理论创新思维。

面对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今天的中国学人在把握和理解经典之原有本义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经典作出与时俱进的新诠释和新发展，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

多年以来，中南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注重将经典研究与现代生活实践相结合，跨越学科限制来把握和诠释中国经典的思想精华，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寻求经典的现代意义。我们认识到，这种实践性和跨学科性其实已然内涵于中国经典之中。讲求道德心性修养和生命的体认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显著特点，这就包含了心理学思想和心理调治的方法，故我们引入西方心理治疗学中的人本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意义治疗等理论，对老庄、管子、王船山等的理论以及一些道经中的相关思想，从心理调节、心理治疗的视角进行诠释，这就有助于将那些可意会而难言传的智慧凸显出来，使其更为充分地发挥修身养性、调节心理的作用；又如，传统经典蕴含了大量治国安民的智慧，强调民贵君轻、仁民爱物、垂范天下、自然无为，其中的思想精华，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深刻的借鉴和启示作用。而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借鉴西方政治学和现代管理学理论对其加以诠释，就可能深化对原典的研究，揭示中国经典在社会治理、企业管理、人际和谐、社会整合等方面的功能和意义，用经典的智慧指引当下的生活，将其融入人伦日用之中。本丛书就是试图对这种努力的某种总结或深化。

在现代视域下，经典诠释作为一种经典文本思想与现代性观念之间的诠释互动活动，为人们提供了驰骋思想和创新理论的舞台。舞台表演必有其基本规则。无论是吹拉弹唱还是京昆沪粤，无论是生旦净丑还是美声通俗，皆应依循特定的剧本或曲谱，不能离谱，不能跑调。同样，经典诠释不是无限度、任意的活动，“六经注我”

和“我注六经”需要相互结合，须在经典原义的基础上进行理解、解释、阐发和实践。

当然，诚如孔子所言，“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要达到以上目标无疑是十分艰难的，但确立目标并朝着它努力奔跑，则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这将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贴近“实践性”这一中国经典和诠释学的共同旨趣，从理论和实践上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焕发出新的光辉。

在为本书作序之时，正值我为完成“二十世纪道学西用研究”国家社科课题在美国进行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新年伊始，漫天飞雪，纽约遭遇零下十多摄氏度的严寒；寓所的窗外，东河静静地流淌，汇入辽阔的海洋。而美国民众喜好中华文化的热情却给我带来暖意，激起波澜！

如果说中国经典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活水源头，经典诠释则是沿其走势不断地修筑和拓展河道，接引四面八方的清泉，沉淀、冲刷泥沙污浊，滋润世人的心灵，汇聚成融通东西方文化的大河，它在世界文明的汪洋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智慧！

是为序。

吕锡琛

2018年元月于曼哈顿东河之滨

自序

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述者《诗》《书》《礼》《乐》，此乐正所以教弟子也。夫子晚年赞《易》，作《春秋》，四术之外又添二经，六艺经传备矣。夫子之后，子夏治经传，汉唐经学衍其流；思孟传心法，宋明理学绍其绪。

论者以为，汉唐经学“述先圣元意”而已，几无创新；理学心学虽标榜“六经注我”，然与稍后西方文艺复兴相较，亦少有创新。更有论者，以为中华近世之变局，皆因卫道之士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所致，进而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若不有所辩证，去其疑虑，则所谓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其难矣。

为学有次第，先述而后有作。

为学次第，《大学》《学记》备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德者，人之所得于天也。在天曰道，人得之而为德。明者，日月之光辉也。明之者，日月所照而万物皆得其明也。人之有明，如日月之有光。明德者，人之聪明睿智所照亮之德也，或谓圣人所得于天而明之者也。明德昭昭如日月，著于六艺经传。明明德者，“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上下求索而明于明德之谓也。明德昭昭，若无上下求索之功则为六艺经传之文；上下求索而明之，则昭昭于心而为德。是故小学者，诵经属文，循规蹈矩之学也；大学者，明于明德，立规垂范之学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明明德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立规垂范也。新民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其德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新而新民也。苟无其德，不可有作，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至善者，民之不能忘之盛德大业也。君子由自新而新民，最终成就治国平天下之盛德大业。

《学记》云：“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先有离经、敬业、博习之工夫，方可期于论学之小成。先达于小成，方可期于知类通达之大成。

先述后作，述以修身，作以济世，夫子躬行之。夫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兴于《诗》”也；“三十而立”，“立于《礼》”也；“四十而不惑”，“深于《书》”也；“五十而知天命”，“以学《易》”也；“六十而耳顺”，“成于《乐》”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春秋》”也。夫子所述皆得于心而成其德，臻于大成而后有所制作。《春秋》之义行而乱臣贼子惧，民到如今仰其德。

经典诠释传统，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西方自由教育之传统发轫于古希腊，复兴于纽曼、洪堡。二人皆主张研究古典学问以达至修养。至20世纪30年代，赫钦斯倡导通识教育，发起名著阅读运动。往后西方之通识教育皆循斯例，通识课程几可等同于经典诠释课程，圣约翰学院最可示例，学生四年须研读百余位思想家之百六十余部经典名著。

由是观之，经典诠释乃修身成德之根本，创新立业之前提。经典诠释绝非抱残守缺，然述多作少之指摘切中经学理学之要害，以今日通识教育理念观之，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皆为自由学术，对经典之自由探讨，旧学或可商量，新知或可期待。

三五同仁，各有所述，集成丛书。主编嘱余以文言作序，反本开新，勉力而为，贻笑方家。

姜国钧

2017年12月27日于阳光100青砚斋

目次

关于老子和《老子》	1
第一章	8
第二章	12
第三章	15
第四章	18
第五章	20
第六章	22
第七章	24
第八章	26
第九章	29
第十章	31
第十一章	34
第十二章	36
第十三章	39
第十四章	42
第十五章	44
第十六章	48
第十七章	51
第十八章	54
第十九章	56
第二十章	59
第二十一章	63
第二十二章	65

第二十三章	67
第二十四章	69
第二十五章	71
第二十六章	75
第二十七章	77
第二十八章	79
第二十九章	82
第三十章	84
第三十一章	86
第三十二章	88
第三十三章	91
第三十四章	94
第三十五章	96
第三十六章	98
第三十七章	100
第三十八章	102
第三十九章	106
第四十章	108
第四十一章	110
第四十二章	114
第四十三章	117
第四十四章	119
第四十五章	122
第四十六章	124
第四十七章	126
第四十八章	128
第四十九章	130
第五十章	132
第五十一章	134
第五十二章	136
第五十三章	139

目 次

第五十四章	141
第五十五章	143
第五十六章	147
第五十七章	149
第五十八章	151
第五十九章	153
第六十章	155
第六十一章	157
第六十二章	159
第六十三章	161
第六十四章	164
第六十五章	167
第六十六章	169
第六十七章	171
第六十八章	175
第六十九章	177
第七十章	179
第七十一章	181
第七十二章	183
第七十三章	185
第七十四章	187
第七十五章	189
第七十六章	191
第七十七章	192
第七十八章	194
第七十九章	196
第八十章	198
第八十一章	200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03

关于老子和《老子》

关于老子，《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拙儒学，儒学亦拙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老子和孔子都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但老子似乎没有孔子那么幸运。孔子的生平事迹，史书上记载很多，每年的9月28日，孔子诞生的这一天，世界

各地的华人都要举行祭典纪念孔子。而老子何年何月何日生，没有人知道。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有人怀疑。“道隐无名”，这或许正是老子要达到的境界。被人纪念和崇拜，多少是对被纪念者自由的干涉，难免有虚伪和作秀的嫌疑。

关于老子的身世，到汉初就已经模糊不清了。司马迁提出了三种说法，一为春秋末年比孔子年长的李耳，一为与孔子同时的老莱子，一为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司马迁个人倾向于认为老子是春秋时期的人，做过周守藏室之史，这个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国家文物馆馆长。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很早就有史官专门掌管图书文物。这种制度至迟在商代就有了，“惟殷先民，有册有典”（《尚书·多士》）。但是商代的典籍到孔子那个时候就已经看不到了，孔子到宋国去考查过商代的典籍，但一无所获。但周代的典籍保存下来了。我们所读的《诗》《书》《礼》《乐》都是周代的典籍。你们想一想，这些书在 2500 多年前就藏在周王宫的守藏室，我们读的这些书就是老子负责收藏和整理的，老子也翻过、抄过、背过这些书。这是一种怎样的美感呢？

在当时任守藏室之史这一官职的人是最有学问、最熟习国家图书文物和典章制度的人。孔子问礼于老子，确实找对了人。不过，到老子这个时候，周王室的守藏室已经破败不堪了。由于周王室内乱，王子朝带了一部分珍贵的典籍逃到了楚国。重要的典籍已经散失，无典籍可守，这或许是老子离职出关的一个原因。“见周之衰，乃遂去”，礼崩乐坏，连记载礼乐的文物典章都已散失，周王朝已经衰落到了极点。老子“不得其时”，故“蓬累而行”，骑着一头青牛出关了。

我们真要感谢那个守关的令尹喜，因为他的强烈要求，老子才留下了“五千言”。那时的守门人，确实是一些水平很高的人。《论语》中的仪封人、石门的那个晨门，都是水平很高的人。预言“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的是仪封人。说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是晨门。所谓“关键人物”，其本义就是掌握着关口钥匙的人，并不是什么领导人。老子的思想能流传至今，令尹喜是一个“关键人物”。

老子对孔子讲的一番话以及孔子对老子的评价耐人寻味。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时候三十多岁。一个年轻人，如果没有一点底气，是不敢去找国家图书馆馆长问问题的。老子告诉

他：“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制定周礼的人、懂得周礼的人、践行周礼的人，早就不在了，连他们的骨头都烂了。到春秋末年，早已是“礼崩乐坏”。“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得其时”就是《论语》中说的“邦有道”，“驾”是驾车而行、出来当官的意思。“蓬”是蓬草，“累”是转动。“蓬累而行”就是像蓬草一样四处飘转，到处流浪。孔子总是说“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这是老子教导他的。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不也像蓬草一样四处飘转吗？“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讲，君子要内修仁德，谦虚谨慎，刚毅木讷，这些也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孔子去见老子的时候，正是年轻气盛、踌躇满志的时候，甚至还有点轻浮急切、喜形于色的样子。老子教导他，年轻人，要稳重一点。孔子后来也这样教导他的学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论语·学而》）。孔子回来后对他的弟子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高深莫测，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力。

对司马迁的记载，宋人即有怀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疑古热中，更多的学者怀疑老子不是春秋末年人，而认为他是战国末年人。持怀疑态度的人主要从两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从思想体系和用词上进行论证。梁启超、顾颉刚、钱穆等大师都持此论。关于用词，梁启超说：“《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1〕二是从文体上进行论证。理由大致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说，有三点：“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之嫌。”〔2〕对于梁启超的观点，张煦随即发难：“《易·蛊》之上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1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1：210．

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是早已‘王侯’联用吗？《易·坎·象》：‘王公被险以守其国。’《离·象》：‘六五之吉离王公也。’不是‘王公’联用吗？……《易·系辞下传》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左传》说：‘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仁义为文，与《老子》所说‘绝仁弃义’‘先仁而后义’有何而不同？”〔1〕胡适一一指出冯友兰的三个证据同样有他自己所说的逻辑问题：“（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子书是孔子以后的作品。你若承认孔子以前果然无私人著述之事，自然不能不承认老子书是晚出的了。但是冯先生应该先证明老子确是出于孔子之后，然后可以得‘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前提。不然我可以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老子之书是什么呢？’（二）‘《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这便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应该先承认‘凡一切非问答体的书都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一个大前提。《左传》所引的史佚周任《军志》的话，《论语》所引周任的话，是不是问答体呢？《论语》本身的大部分，是不是问答体呢？（《论语》第一篇共十六章，问答只有两章；第四篇共二十六章，问答只有一章；第七篇共三十七章，问答只有七章。其余各篇，也是非问答体居多数。）《周易》与《诗》三百篇似乎也得改在《论语》《孟子》之后了。（三）‘《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这更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先得承认‘凡一切简明之“经”体都是战国时的作品’一个大前提。至于什么是简明的‘经’体，更不容易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经’体。那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不是‘简明之经体’了吗？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丐辞，就是我们还得先承认，‘《论语》虽简明而不是“经”体；《左传》所引《军志》周任的话虽简明而也不是“经”体；只有《老子》一类的简明文体是战国时产生的“经”体。’我们能不能承认呢？”〔2〕至于梁启超等人所说的，《老子》中的思想似乎处处针对儒家和墨家而发，反对者确实难以辩驳。胡适也只是说，这种推理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两边割。你的成见向东，它便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向西，它便助你向西。

〔1〕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12。

〔2〕 欧阳哲生选编·胡适论哲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239-240。